

我国政策计量研究: 方法与模型*

马海群^{1,2} 张斌³

(1.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2.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3.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分析政策计量领域常见的研究工具, 发现哪些研究工具经常同时使用并分析其原因, 更好地发挥类似工具在政策计量领域的作用。收集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文献,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 结合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 从中心性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定性解读和定量分析。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在政策计量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是定性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表达手段仍然不可或缺, 还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 计算难度较小, 学习成本较低, 操作更加灵活的研究工具更被研究人员所青睐。

关键词: 政策分析; 文本计量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 度数中心度

中图分类号: G351.3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9.05.001

政策是一类特殊的文献记录, 既包括各种带有官方性质的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等), 也包含各种咨询、评论等半官方性质的文本, 涉及金融、养老、科技等各个领域。而对政策进行研究的方法, 受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思维, 历来以采用思辨的方式, 以定性分析为主。在以前数据量尚不算很大的年代, 此种方法对政策研究领域确实有促进作用, 但是当数据量开始激增, 各种类型的数据层出不穷的时候, 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开始对政策研究产生限制性作用, 制约了该领域的健康发展, 并且不利于我国在政策研究领域赶超国外的研究水平^[1]。图灵奖得主、关系型数据库鼻祖Jim Gray在2007年提出“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的概念^[2]。与此同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完善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 使得传统的、在理工科研究中曾被大量使用的诸如文本挖掘、信息计量、信息可视化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开始被人们所重视, 并且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产生了一系列计算性人文科学, 诞生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成果。同时在政策计量分析领域, 一系列模型和方法的应用也让可以分析的政策文本的数量和精度方面有了大幅提升, 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理念, 如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语义分析、对政策的立

场倾向和情感进行深度分析等, 这也说明政策分析领域在计量工具加入后慢慢走向成熟^[1]。

1 国内外有关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国内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政策来进行计量分析。黄扬^[3]从政策工具的视角, 借助内容分析法, 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编码及频数统计和维度等, 对多份由中央层级发布的关于中国公共图书馆计量有关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 进而了解当前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而为后续的政策计量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借鉴。马海群等^[4]通过使用S-CAD方法, 系统评估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效果, 对该政策文件的逻辑性以及投入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进行了解读, 进而发现了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而得到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以促进国家信息政策的完善。黄萃等^[5]对1978—2013年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化计量分析和研究, 并阶段性地考察了该类型下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定量分析了不同阶段下不同政府部门的关系, 并且得出了我国政府部

*本研究得到黑龙江大学对俄问题研究专项项目“俄罗斯信息安全体系研究”(编号: DEZ1906)资助。

门在该类型的政策领域之中合作呈现出逐步加强的态势,合作部门数量逐渐增多,合作深度慢慢加深,合作复杂性逐步增强;发现了少数核心合作关系的部门,产学研相结合的程度不断提高,并且从责任和利益两个角度对推进我国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建议。裴雷等^[6]结合目前的大数据环境,探讨了政策文本计量的方法论基础和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工具,梳理了有关议题并总结归纳了在政策文本计量中用到的工具存在的不足,同时对该种类型的方法在未来继续研究政策精细化进行了有关讨论。张越等^[7]在语法分析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核心词汇的构成模式,进而构建可以抽取政策文本核心词汇的模型,并对有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抽取,最终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文献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从国外的已有文献来看,在政策计量领域,国外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优缺点的对比研究上。Hjorth等^[8]将CMP RILE measure政治演讲语料库作为研究的文本,对比自动文本分析和专家调查分析对该语料库的分析情况。实验结果表明,在Spearman相关系数上,自动分析技术明显优于专家调查分析技术。而Proksch等^[9]以政见语料库为分析对象,发现研究结果出现的偏差主要集中于文献编码的阶段,不论是采取专家进行的手工编码抑或计算机的自动编码,而非计算机算法本身所造成的缺陷。

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政策计量研究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到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模型、方法、指标或者体系等研究工具,发现经常同时使用并且发挥主要作用的研究工具,进而从中得到规律或者特征,发现更加适合的工具来帮助人们了解和认知该领域。

为完成以上目的,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10],借助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生成共现图谱,然后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实例论证,直观具体地反映出结论。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间接考察社会现象的方式,包括对统计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贯穿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是该领域的常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论性统计分析两种,本次研究以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通过运用一定的统计量来说明数据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容分析法是

一种将统计资料可以定量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可以客观、系统地对所发现的结论进行较好的展示与说明,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符合要求的文章进行分类、处理与甄别,然后将整理好的数据通过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的输出,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直观具体地反映出节点间的亲疏关系,并通过具体指标来揭示起到关键作用的方法有哪些。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3.1 数据处理

为了最大化地获得所需要研究的数据,本研究选择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使用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数据查询,检索数据库勾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具体检索条件以及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检索条件及检索结果

检索条件	检索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条
主题=政策量化,其他条件默认	1 066
主题=政策计量,其他条件默认	382
主题=文献计量,主题=政策,其他条件默认	133
主题=政策计算,其他条件默认	132

检索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总计得到1 713条数据。对上述内容进行数据清洗,采取人工检索的方式,去掉重复内容、征稿启事、新闻通稿、关键词空白的文章及与本研究不相关的文章等,得到有效数据1 480条。

首先,对研究工具进行界定。《现代汉语词典》把“工具”比喻为“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工具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所以,本文将研究工具界定为用以完成某项特定的科研目的,所用到的方法、模型、指标、体系等手段。

其次,在1 480条有效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处理。为确保获取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结合上文对研究工具的界定,采用如下方法。

分别以“模型”“法”“指标”“体系”“方法”为关键词,依次检索所有文章的题目、关键词和摘要,并且对文章正文介绍研究方法的部分进行浏览,提取每篇文章所应用的模型、方法、指标和体系;在经过一段

时间后,以相同的条件对文章进行重复浏览与检索,以此来确保可以尽量全面与精准地把研究工具都包含进来。对于第二次检索过程中被遗漏文章进行仔细研读,直到确定是否符合本研究要求为止。

经过两次检索,共得到587篇可以纳入研究范围的文献,对上述文章依次进行编号处理,在Excel表格中,以每一篇文章单独作为一行来存储该文章所使用的研究工具。

将上述表格中出现的含义相同,但是不同表述的工具进行合并,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都替换

为“DSGE模型”;然后将上述提及的研究工具生成共现矩阵,同时对表述含义较为宽泛的词语,阅读具体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将提到的如“理论模型”之类的词语进行细分。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出现频次为1的研究工具对本研究没有意义,所以将出现频次为1的研究工具剔除,只保留频次大于或等于2的研究工具,之后生成研究工具共现矩阵。借助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和NetDraw2.084,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研究工具共现知识图谱,每种工具在知识图谱中表现为一个节点,计算节点的度数中心度,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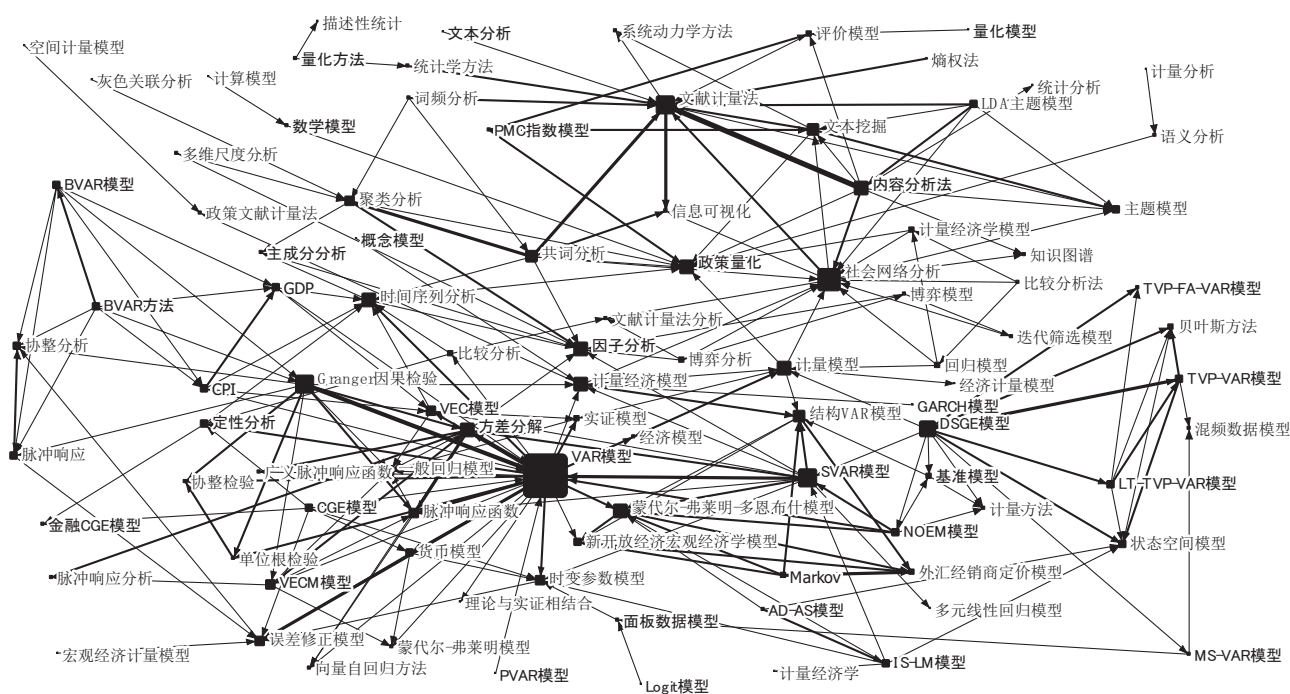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工具的度数中心度示意图

3.2 数据分析

(1) 密度与标准差分析。密度(density)代表的是网络中节点的关联程度,密度数值越高,越接近1,代表网络中成员之间的联系越紧密,集中度越高,信息在成员之间的交流越通畅。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用来揭示各个成员节点之间的核心度差别大小,若标准差小,而密度较低,则说明该网络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节点被瓦解而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即具有较强的外在抵抗的能力^[1]。计算上文共现矩阵的密度和标准差,可以得到587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政策文本研究工具的密度为0.027 7,标准差0.244 6。密度较低,说明该网络较为分

散,节点之间的联系较弱,尚未形成研究工具体系;而较低的标准差也说明节点之间的核心度差别较小,未形成关键节点,即使其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研究工具在特定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也不会影响该领域整体的发展趋势,不会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带来迟滞作用。

(2) 中心性分析。度数中心度是社会化网络分析刻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一个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高^[1],在图1中反馈的就是方框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数目越多,说明和它一起使用的研究工具的数目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粗,说明二者联合使用的频率越高。

在UCINET6中计算各个节点的度数中心度,并结

合图1可以看出, 度数中心度排名在前五位的依次是: VAR模型, 度数中心度30; 社会网络分析, 度数中心度16; 文献计量法, 度数中心度13; Granger因果检验, 度数中心度12; DSGE模型, 度数中心度11。

(1) VAR模型。该模型也称为向量自回归模型, 是Christopher Sims在1980年提出的一种常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其基本构造见公式(1)。

$$Y_t = AY_{t-1} + BY_{t-2} + CY_{t-3}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Y_t = (GDP_t, M_t, LOAN_t, R_t)'$, ε_t 为扰动项, A 、 B 、 C 为参数矩阵^[12]。该模型的建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 把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 常用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而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 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回归模型。

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联合使用适应现代化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自媒体时代产生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让传统的处理工具显得“捉襟见肘”, 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强调用数据来表达各种信息。与其他研究工具相比, VAR模型具有不用严格依据各种理论, 只要有数据便可说明结论; 只要样本数据所包含的内容足够多, 就不会存在无法识别模型的优点, 而这两种优点正是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时代所亟需的。VAR模型的应用, 让数据分析可以摆脱以往只能依靠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按照理论进行解读与分析的局面, 更好地帮助各种最新的成果可以被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肖志勇等^[13]为了评价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选择合适的变量, 借助VAR模型,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对有关变量对CPI造成的影响进行计量, 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基本可以的; 赵昕东等^[14]为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证结果, 鉴于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是内生还是外生尚存在争议, 于是选用VAR模型规避这个问题, 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图1中经计算度数中心度为7, 二者之间的连线强度为4.0)来进行货币政策的冲击响应分析, 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在货币政策的变量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结合上述已有研究的实证分析内容可以看出, VAR模型在使用中并非作为单一工具发挥作用, 而是联合其他工具, 或者是作为分析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种工具。如图1中的误差修正模型(度数中心度为7, 二者之间的连线强度4.0), 是Granger为了更好地修正VAR模型处理平稳性数据时丧失部分信息的问题而建立的^[15], 说明该模型仍在发展中。

(2) 社会网络分析。该方法指的是对构成社会网

络的各种因素及其属性进行分析的一套规范的方法和手段, 又可以称为结构分析^[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社会网络分析不仅仅是方法或者手段, 更体现了结构分析的思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把所分析的每一个对象看作互有关联的要素, 从整体来看待所分析的问题。如果说该方法主要提供的是一个思想, 那么思想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上则须结合其他的方法。

从图1可以看出, 和社会网络分析主要一起使用的是文献计量法(二者之间的连线强度为3.0)。其原因是: 首先, 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普适性比较强, 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局限性, 不可能每次研究都获得实际的研究对象, 而文献计量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便利; 其次, 在大数据环境下,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愈发普遍, 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只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点来看待, 而是要看到该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表面联系, 而社会化网络分析不仅可以分析所要研究问题的结构, 还能够对其属性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最后, 社会网络分析不仅能对微观现象进行解释, 也可以对宏观问题进行把握, 而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评估等过程涉及各个层级的问题, 涉及的因素也包含很多方面, 正好与社会网络分析的特点相契合, 符合应用该方法的要求。

(3) 文献计量法。该方法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文献”指的是包含我们要加以研究的对象的信息的各种载体。文献资料既包括直接的“一手”资料, 也包括间接的“二手”资料。“计量”即为了形象、直观、科学地展示科研成果, 采取数学以及统计学的计量方法, 基于各种文献的外部特征, 如进行资料的汇总与整理, 制作专门的统计表与统计图, 对有关图表展示出的趋势进行集中或者离散的趋势分析, 借助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 即计量性的输出。上述二者决定了文献计量法势必不可能单独作为研究工具而使用, 必须结合其他方法来展现出研究成果。

文献计量法应用的领域横跨人文社会科学类和理工类, 从图1可以看出, 内容分析法与文献计量法联系密切, 原因有如下方面: 首先, 两种方法的研究性质类似, 内容分析法在研究性质上不否定定量性, 与文献计量法一致; 其次, 研究目的类似, 都是通过统计发现所研究对象在特征量上的规律, 进而发现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 再次, 两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都离不开数学、哲学和统计学的有关内容和知识; 最后, 网络环境下出现的各种多元化类型数据让传统的单一分析方法显得

力不从心,而且各种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弊端,为了适应大数据和“互联网+”环境下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将二者结合使用在诸多领域可以体现。师俏梅等^[16]为研究中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将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进行综合,从中国知网得到1986—2008年的8 194篇论文数据,通过对发文时间、作者单位、被引频次及文献主题的分析,确定研究热点,构建了高校数字图书馆发展模型;王珏辉等^[17]通过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对2001—2010年来国内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0年,我国的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良好,发展势头猛进,但是相对于国外的发展来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同时希望政府在不同领域进行政策的扶持,以便更好地助力新兴产业的发展。

(4) Granger因果检验。该方法是用来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出者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live W. J. Granger。Granger因果检验依赖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回归,如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得不到保证,那么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从而导致Granger因果检验不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

Granger因果检验是伴随VAR模型以及其他各种工具的使用而在过程中逐渐起作用的。由图1可知,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之间的强度最大,达6.0。该结果说明,虽然Granger因果检验存在不足,但是仍不妨碍将其运用到社会实践研究中去,同时基于该方法的各种衍生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的不足。关芳等^[18]为研究高校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之间的影响因素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收集大量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了与之相关的4个因素间的关系,并借此构建了有关模型,可以更好地为数字文化利用,提高相关服务的质量以及帮助读者更好地利用有关数字资源提供了方案和参考。

(5) DSGE模型。该模型又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既包含理论建模,也有随机模拟的内容,同时使用贝叶斯方法进行评估,是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模型,其具有动态、随机与一般均衡3个特点。动态指的是模型从经济个体的角度出发,探讨的是如何进行跨期最优选择(intertemporal optimal choice)的问题,借此可以讨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各个变量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随机指的是该模型将各种外在、内在的因

素都考虑进去,包括但是限于各种冲击,以及随时根据不同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不同的调整,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一般均衡则指的是综合考虑经济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市场、生产者、消费者等各个环节,结合他们的偏好以及在合理的预期之下,对未来做出的正确抉择。作为一种将最优选择作为最终目的,同时考虑各个因素的模型,自然离不开与TVP-VAR模型联合使用。

该模型所具有的特点,使其应用在政策计量研究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因为不同类别的政策在计量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在考察不同类别政策实施效果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金成晓等^[19]利用DSGE模型,研究确定如何将适度的货币政策进行划分,重点分析确定该政策中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重要指标,在借鉴Smets和Wouters于2003年提出的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工资和价格黏性引入他们建立的模型之中,构造了包含家庭、中间产品商、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及银行4个部分模型,同时采用从1999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进行实例分析来验证提出模型的有效性,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杨子荣等^[20]将中美两国作为研究因素纳入DSGE模型,计量性地研究了两国的货币政策,纳入模型的考虑因素有家庭、厂商、资本的不完全流动性、一价定律缺口、货币政策及财政当局等,得出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的双向溢出效应具有不确定性等结论,相比于之前的单纯理论分析,使用模型的方法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更加直观具体的结果。

4 结论

政策计量作为一种全新的政策研究领域,伴随着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成熟的计算思维,开始广泛地渗透到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政策计量研究涉及的领域多样,目前常见于金融经济类政策,在科技、养老及农民工政策等领域也有初步应用,今后在一般政策中也可以进行尝试。本文通过对政策计量研究有关论文进行梳理,在分析总结政策计量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的重要程度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

(1) 定性分析方法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近年来兴起的定量研究方法为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可以更加直观具体地反映出结论。

但是定性分析仍然起到了辅助定量分析的作用。从产出形式来看,定量分析产生的是数字,具体探究数字的内涵与意义还是要依靠定性的语言来表述。

(2) 易于计算、灵活性较强的研究工具受到偏爱。以VAR模型、DSGE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为代表的新型工具可以快速地政策计量领域所接受,一是由于原领域与政策计量领域有相同点,二是其本身特性起到重要作用。易于计算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得出研究结论,灵活性较强代表着更好地移植进政策计量领域发挥作用。如将政策文本向量计量,之后向量之间的计算借助VAR模型即可;在进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时,不同类型的政策有不同的标准,需要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由此可以借助DSGE模型进行考察,并在考察过程中动态调整。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进一步依据不同的学科门类对研究工具进行划分,如果进一步进行归纳,总结出重要性最强的研究工具属于哪一学科门类,进而也会从这些学科门类中发现更加适合的研究工具,而不仅局限于上述5种,期待以后可以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1] 傅广宽,韦彩玲,杨瑜,等. 量化方法在我国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进展研究——以最近六年来的进展为研究对象[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 (4): 109-113.
- [2] 孙瑞英. 大数据环境下国家情报工作和谐演替的动力机制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8 (6): 8-15.
- [3] 黄扬.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政策量化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 2018 (6): 55-61.
- [4] 马海群,冯畅. 基于S-CAD方法的国家信息政策评估研究[J]. 情报学报, 2018, 37 (10): 1060-1076.
- [5] 黄萃,任弢,李江,等. 责任与利益: 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 (12): 68-81.
- [6] 裴雷,孙建军,周兆韬. 政策文本计算: 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J]. 图书与情报, 2016 (6): 47-55.
- [7] 张越,刘琦岩,张玄玄,等.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中的领域关键词提取研究[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18, 50 (3): 68-75.
- [8] HJORTH F, KLEMMENSEN R, HOBOLT S, et al. Computers, coders, and voters: Comparing automated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arty positions[J]. Research & Politics, 2015, 2 (2): 1-9.
- [9] PROKSCH S O, SLAPIN J B. How to avoid pitfall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texts: the case of Germany[J]. German Politics, 2009, 18 (3): 323-344.
- [10] 林聚任,泥安儒,刘玉安.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UCINET软件实用指南[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9.
- [12] 刘进财,朱娇.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J]. 未来与发展, 2017, 41 (11): 42-48, 24.
- [13] 肖志勇,刘涛.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J]. 改革与战略, 2009, 25 (9): 57-60.
- [14] 赵昕东,陈飞,高铁梅.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7): 103-106.
- [15] 孔德意. 我国科普政策主体及其网络特性研究——基于511项国家层面科普政策文本的分析[J]. 科普研究, 2018, 13 (1): 5-14, 55, 104.
- [16] 师俏梅,田苍林,黄辉,等. 中国高校数字图书馆二十年发展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1 (2): 28-31.
- [17] 王珏辉,矫艳萍,李向梅. 国内新兴产业十年发展形势的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 2011, 29 (10): 1472-1475.
- [18] 关芳,林强,尹瑾,等. 高校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探索, 2015 (5): 32-35.
- [19] 金成晓,卢颖超.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计量分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4, 34 (3): 3-12.
- [20] 杨子荣,徐奇渊,王书朦. 中美大国货币政策双向溢出效应比较研究——基于两国DSGE模型[J]. 国际金融研究, 2018 (11): 14-24.

作者简介

马海群,男,1964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政策与法律。

张斌,男,1991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政策与法律,E-mail: 254998915@qq.com。

Abstract: To find out which research tools are used together an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used together can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similar tools in the field of policy quantification. Literature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study was collec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qualitatively interpreted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Althoug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policy measurement and have achieved a series of research results, qualitative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expression means, is still indispensable and has a certain role and status. Researche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research tools with less computational difficulty, lower threshold and more flexible operation.

Keywords: Policy Analysis; Text Measurement Researc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egree Centrality

(收稿日期: 2019-04-21)

■ 会议报道 ■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趋势解读报告会召开

开放出版时代,为更好地构建开放资源环境,形成新型资源建设模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19年5月13日特邀图书情报领域知名专家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对元数据资源建设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开放获取信息资源新趋势做专题解读,来自全国图书馆、信息研究所、高校等文献领域工作者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陈传夫教授指出,在进行过多来源元数据集成管理过程中,由于元数据类型多样、来源渠道复杂、采集方式不一、涉及多方主体,存在复杂的版权管理问题。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提供机构应注意保证元数据产权清晰,确保元数据合法性,完善授权许可机制,充分运用适用于图书馆等公益机构的法律或规则,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防范版权风险。

方卿教授从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解读了社会各界在开放获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与所持态度,指出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及图书馆界是开放出版的倡导者与支持者,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在期待开放获取的同时对资源质量有所忧虑,行业学会协会则认为开放出版模式存在一定风险,而大多数出版商对开放存取一直持怀疑和抵制态度。随着开放出版体制机制的完善,需要妥善处理学术标准与收费的关系、坚持同行评审、培养专业编辑队伍。

开放资源建设与元数据集成服务对数据的获取、保存、共享、重用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作为开放资源的建设者、整合者、服务者,应重视开放资源和元数据资源建设,注重采集、加工、分析数据,以及服务过程中的版权问题,积极应对开放获取时代的机遇、风险与挑战。